

写诗的少年

张建新

学或课间时跑一趟，塞几封投稿信到邮筒里，基本都是石沉大海。

1988年，初中毕业，因家里贫困，我就去读技校，可以早点出来挣钱。

在技校读书时，偶尔看到同学们手中传阅一本本地的油印刊物，刊名叫作《小小文学》，以诗为主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民间刊物，便借来翻阅，甚至按刊物上的地址寄去诗，当然也是没有回音。

1990年，我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县医院做电工，17岁。1992年或者1993年的一个中午，下班时，正向医院大门走去，听到有人在门边叫我，隔着铁栅栏，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跨着自行车正看着我，他问道：“听沈天鸿老师说，你也写诗？”就这样，我认识了詹永东，他当时在医院从事行政工作，我知道了医院除我之外，还有一个写诗的人。

有次我在医院边小路上散步时，碰到了詹永东和好几个人一起，他向我介绍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的胖子，说这是张巅，他们刚喝完酒，脸色通红。张巅和我握了握手，从包里掏出一本诗集，签名后递给我，那是他的诗集《张巅诗选》。能出版个人诗集，令我羡慕不已。

詹永东住在新桥东村的一个出租房里，有段时间他因心跳过缓在家养病。那年冬天，我去看他，他很兴奋地拿出一个笔记本，把他新写的一

首诗给我看，诗名叫《黑豹》，他很满意这首新作，读给我听，我不甚明白，但感觉很新颖。

跟着詹永东陆续认识了不少县城写作的人，如诗人江同杰、周国平、沈厚明、南雁、周能兵、方龙斌等人，还有写小说、散文的何立杰、汤一阳、吴禾旺等。

南雁在回龙路开了个书店叫儒林书府，我们经常去，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酒量特别大。方龙斌在县粮食局工作，我们也常去他单位食堂打牙祭。他们每次在一起都斗酒、神聊，我比他们小十来岁，基本上插不上话，静静坐着，听他们海阔天空、神游八荒。后来陆续结识了当时在乡镇生活和工作的崔国斌、罗艺红、王双发、查耿、檀亮、张丽萍、陈少林、苗秀侠、李皓、金国泉、汪椿桦等人。

除了县城一帮人外，崔国斌和我联系最密切，他在江边一所中学教书，周末时，要么他来

县城，要么我去他学校。有十几公里路程，自行车是我们的交通工具。有次在崔国斌的学校，用他从华阳大轮码头买来的卤菜和花生米，我们喝了一瓶黑米酒，就都醉了，枕着江水在江堤草地上躺了一下午。我们一起写了不少同题诗，有的甚至被《星星》诗刊这样的诗歌专业刊物发表了出来，让我们感到很是振奋。

1990年代，我在县城除了工作，就干了两件事：踢球、写诗。后来，诗歌逐渐边缘化，大多数人放下笔，选择了从政或经商。热闹和喧嚣过后就是平静，写诗毕竟是个体的事，甚至羞于被人提及。我是个没什么理想和追求的人，在百无聊赖之余写写小诗，所以一直断断续续写了下来。



清明 {版画} 刘晓宇 作

烟头上烧，火光一闪一耀，反射在他瓶底厚的眼镜上，和他如炬的目光一起，亮得好笑。

父亲是个暖融融的父亲，诙谐幽默，孩子们都愿意跟他玩。讲故事的时候，他伸手把我们揽在怀里，温暖的胸怀散发着烟草的香气，温暖的手掌也散发着烟草的香气。当他用长满胡须的下巴来扎我们的小脸时，我们闻到的还是烟草的香气。

父亲的烟一直抽到老，他自己舍不得买好烟，藏着的好烟多来自儿女的孝敬。父亲也虚荣，得了好烟后，总是高调地在人群中抽，三五好友，一来二去，一包烟很快就发完了。这时他是很有点心疼的，但又爱面子，说下次口袋里揣两包烟，一包普通的，一包好的，人家要是递一般的烟，他就递一般的，人家要递好的，他就递好的。不怕掏错了？我们问他。他说不怕，左边一个口袋小苏烟，右边一个口袋小熊猫，记着呢。

父亲的好烟还没有抽完，就在八十六岁的那年春天中风了。刚开始有人给他点烟，他歪着嘴还能吸两口，很快就不再眼馋，甚至开始讨厌烟味。三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晚上，黄昏的云刚刚褪去绛红，我给他喂饭，用热毛巾洗净他的手和脸，洗手的时候，他被烟熏黄的修长手指还是以前夹烟那个姿势，只是焦黄色稍稍淡了，我笑他大烟鬼子，他闭着眼睛，没理我，很享受的样子。家人试了试鼻息，说他走了。我平静地继续给他擦身，他的身体依然有淡淡的烟草味道，但从前那样热烈的温暖消失了。从此，我闻不得烟味。

从记事开始，每天清晨，我是在烤烟的气味中醒来。

黎明的微光从窗外隐隐透进屋子，母亲披衣坐起，靠在床头，装烟。她有一个小烟袋，古檀色的木柄，黄铜的烟嘴，挂着一个布包，是切得很细的烟丝。“嚓”，她划了一根火柴，橘黄色的光一下映在她刚刚睡醒的脸上，吸几口，屋子里立刻弥漫了淡淡的青烟。我趴在她的怀里酣睡，暖暖的，香香的，烟草的味道也是，暖暖的，香香的。那些清晨短暂的烟气和母亲的暖香，是我对母亲最初的记忆。

若是父亲在，他们会一起抽完一袋烟，悄声计划着一天要做的事情，窸窸窣窣把衣服穿上，把孩子们的被子掖好，掩上门出去。烟草的味道，像他们留下的体温。

晚饭后的闲暇时光，我们在堂屋玩耍，父亲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抽着纸烟。父亲的纸烟，“春秋”“渡江”居多。父亲是公办教师，有固定工资，烟算有档次的。偶尔他也抽“白纸包”，白纸包最便宜，我们庄子里大部分人抽白纸包，白纸卷上烟丝，装在洋红纸的纸盒里，烟味很呛。母亲忙



完了，也坐下来。让我们找父亲要烟。这时候的父亲开始导演我们家的经典剧本。

“谁找我要烟？”他问母亲第一个派来的孩子。

“俺娘！”

“你娘叫什么名字？”他从烟盒往外敲烟，笑着继续问。

孩子不答，叫母亲的名字在我们的传统中是大逆不道的。

“不说不给！”父亲绷着笑，把烟佯装往烟盒里回放。

孩子又奔回母亲的面前，告诉母亲。

母亲露出嘲讽的笑意，“瞧他能有的！你就说彩霞找他要烟。”

得了母亲允许的孩子再一次趴到父亲的膝头上。

“彩霞找你要烟！”

“学我说，彩霞要烟。”父亲捏着嗓子，用顿挫起伏的音调说。他把“霞”故意念成“吓”。

到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断然不敢再从。

母亲笑着喝令：“孩子们，抢！”

父亲哪里还坐得住？他一只手夹着燃着的烟，另一只手要把烟盒往怀里藏。有人抱着他的腰，有人就抢走了他的烟盒和火柴，给母亲送过去。

一个孩子给她划着了火柴，点上